

活水浇出满园春

刘文嘉

近日,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推动文艺创作和评论有效互动,增强文艺评论的战斗力、说服力、影响力。按照《意见》的要求奋力探索,一定会有更多优秀的文艺评论涌现。

《山海情》热播,知网里短短半年内涌现出100多篇相关论文;《觉醒年代》上线,微信里能搜索到至少两万篇讨论文章。如潮的评论里出现两种少见的现象:社交媒体上惯于嬉笑怒骂的年轻人以如此敬仰的语气谈论电视剧,少见;学者专家们以如此澎湃的热情来赞美电视剧,也少见。

这都源自作品自身硬。而这种“硬”,实际上是深刻的文艺观的外显。论视觉,观众为什么不看玄幻剧里云鬓高挽、衣袂飘飘的“英雄”,却选择看黑脸膛、红背心、站在漫天黄土里的西北农民?论题材,年轻人为什么觉得身边故事“悬浮”,却愿意齐刷刷地回望100年前的历史风云,甚至因为《觉醒年代》而纷纷递交入党申请书?因为这样的作品,其故事来源是实践,其价值归宿是人民,具有深远的改造现实、推动历史进步的社会功能。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精髓。

百年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落地中国实践,不断形成新的中国化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奋进新时代的珍贵经验,同样也是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关键。文艺作品与文艺评论,需要在这样的文艺观上同频共振,“原理”移过来、“方法”自己造,才能实现量体裁衣、因地制宜。

马克思主义本人也曾写过“文艺评论”。在《神圣家族》中批评法国小说家欧仁·苏的作品《巴黎的秘密》及相关评论时,他曾一语中的地指出,这些文章的根本问题是“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伯爵夫人、侯爵夫人、浪漫女子、看门人、公证人、江湖医生”,不过都是从一个抽象范畴造出的现实世界。考察作品中人与事是否真正来自实际、来自实践,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示范。

今天的“中国具体实际”,无疑为文艺创作与评论提供了开阔的空间。这个“具体实际”,是积厚成势,是由富而强,是数千年小康梦圆的壮阔图景,是14亿人整体迈向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从南国到北疆的脱贫故事,是“再也找不到一个不通电村庄”的惊叹。扎根这样的实践,《山海情》才最终把大时代装进了小村庄。紧密跟踪这样的实践,文艺评论才能提炼出中国故事的讲法,把握住讲好中国故事所需要的情感基础、社会心理、大众诉求,引导推动更多的《山海情》出现。

同样,弘扬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需将马克思的立场、观点、方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抵达全人类共同价值,恰恰需要传承中国文化精神、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传统文艺评论留给今人很多遗产,与传统文艺创作的特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每每托物言志、善于妙喻说理,表达凝练节制,但又意境深远。苏轼认为陶潜的诗有一种内在充实,比喻说“质而实绮,雅而实腴”,就体现了一种传统文艺评论的审美特征和语言张力。今天我们的文艺评论或可从中去芜存菁,逐渐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中国表达,确立自己的基本话语,构建自己的命题学说,形成自己的方法思维。

## 鲁迅作品的五种读法

张梦阳

今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四十周年,同时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阿Q正传》发表一百周年。由《阿Q正传》的阅读史、争论史,我以为,可以总结出五种鲁迅作品读法。

### 深读法:鞭辟入里

从作家的创作本意与知情者的本初评论出发,是作家、作品研究的正确途径。

作家自己的陈述,是理解作品本意最可靠的根据。鲁迅1926年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自己陈述《阿Q正传》创作主旨时,也说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他“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由此提醒我们,要准确理解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就必须深读。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得到启悟,“开出反省的道路”。否则,如果只是浮浅化、庸俗化地当作滑稽小说去读,只能适得其反,扭曲鲁迅的本意。

### 博读法:联想比较

我以为,要读懂《阿Q正传》,仅限于读这一本书和鲁迅著作是不行的,需要博览群书,从世界文学视野对《阿Q正

传》进行比较与联想。当年茅盾在《阿Q正传》刚发四章时,就发现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奥勃洛摩夫等著名人物很相像,就在于他博览过众多外国文学作品。

其实,《阿Q正传》跟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珂德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更为相像。阿Q、堂·吉珂德、哈姆雷特等偏重反映人类精神弱点的艺术典型确实成为一种讽世的镜子,人们可以从中照出自己的精神面貌。阿Q反映了人们失败后在假想中追求精神胜利的普遍弱点,堂·吉珂德表现了落后于时代的主观主义的荒谬和愚蠢,哈姆雷特演绎了人们在关键时刻易犯的犹豫性格,奥勃洛摩夫体现了俄国地主贵族的懒惰与散漫。它们最重要的哲学启悟意义就是:对人们的认识逻辑、方法进行反思,启示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纠正缺点,正确行动。

只有通过博读法,广博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历史典籍和文学经典,才可能理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

### 省读法:反躬自问

鲁迅1934年11月14日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总结自己的创作初衷时说过:“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所谓“开出反省的道路”,实质上就是作家设法把自己的精神主旨传达给读者,又设法使读者逐渐接受、进行反思的道路。

鲁迅早期在《摩罗诗力说》中就阐述过这样的原理:人人心中有“有诗”,但是大多数人“未能言”,要靠“诗人为之语”,为之“握拨一弹”,读者则“心弦立应”,而且“益为之美俾强力高尚发扬”,产生积极的反响。这启示我们:要读懂《阿Q正传》,就须把自己放进去,与鲁迅心贴心地反省自己,做到“省读”。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所醒悟。

## 大街小巷寻找少年英雄

徐翌晨



《不能忘却的少年欧阳立安》 《少年英烈袁咨桐》

相比于其他文艺形式,文学在讲述党史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更容易以艺术魅力去感染读者。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看来,百年党史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富矿,每一个作家都能在其中找到想要的创作素材。关键的难点是如何用文学的手法将真实的历史叙述好、呈现好;如何借助文学的魅力,让波澜壮阔的党史抵达人心,使读者在情感上同频共振。

何建明说:“我一直认为,在坚持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应该让革命史‘立’起来,让历史人物‘活’起来,我的多部作品一直作着这方面的探索。”

从今日刊发的这篇《大街小巷寻找少年英雄》中,可以看到何建明的信念、探索和实践,对我们的创作和阅读颇有启发。

——编者

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牺牲的革命者难以计数,仅上海龙华和南京雨花台两座革命烈士纪念馆展示的就有约3000位先烈的事迹。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这一次书写

## 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深情表达

李炳银

《大国治村》,是报告文学作家李英投身浙江乡村建设大潮,对几个具体的乡村深入采访之后,提供给读者的真实生动的故事与变化巨大的图景,令人振奋,感慨良多。相信这部作品,在浙江,乃至在全国各地开展乡村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会给人许多启发和实际的帮助,对于推进乡村治理和改变中国乡村面貌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具有价值,而且,在通过文学热情积极地融入时代、生动地书写新鲜的中国故事等方面,都有很好的示范性。

《大国治村》真实描摹了淳安县下姜村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成为几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基层联系点,通过近20年的发展,形成了精准扶贫的“下姜模式”,成为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典范。

作品真实生动地描绘了武义县的后陈村,如何在胡文法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在村民的支持下,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将一个贫穷、村务混乱、“前腐后继”、矛盾不断的“上访村”,建设成了经济发展、邻里和谐、人心思进、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后陈经验”受到国内外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甚至影响到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作品还抒写了杭州市临安区上田村发生的细微而又巨大的乡村变革,它是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的发源地,又是浙江省第一个“微法庭”的诞生地,成为“枫桥经验”的升级版,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者和获益者。

下姜、后陈、上田村等地的新旧变化,使人感受到了时代的潮流,同时也具体深刻地感受到了民间的智慧和

的,是大时代背景下的少年英雄——《不能忘却的少年欧阳立安》与《少年英烈袁咨桐》,两本书也是何建明首次尝试儿童文学写作。欧阳立安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位,袁咨桐则是南京雨花台的小英雄,他们牺牲时正是十五六岁的少年。

十几岁的少年英烈在历史中相关资料极其稀少,甚至只有一个模糊的名字。即使回到他们的家乡,由于少小离家投入革命,生命又如此短暂,与他们相识的乡邻亦是稀有。何建明只能在与少年英雄共同被捕就义的共产党员所留下的只言片语里,分辨出他们依稀的影子、相互印证的痕迹,用有限的素材,架构、恢复当时的历史场景。何建明想尽可能多地把留下名字、不为人知和没有留下真实姓名的牺牲者们,全部融入他的文学叙述中。

### 弄堂里的寻找

“记得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看着那些英俊的遗像时,仿佛看到了英烈们的内心世界,是那样的丰富和炽烈。”何建明说。

“天下洋楼我工人造,资本家坐在洋楼哈哈笑,国民党看门来把守,共产党为工人坚决奋斗……”这是欧阳立安在监狱里吟成的诗,后来被一名获释的同室“狱友”带出了监狱,新中国成立后收录进《革命烈士诗抄》之中,这也是欧阳立安这位小烈士留在世上的唯一诗作。

其实,在何建明写作的报告文学作品《革命者》中,曾经有过关于欧阳立安的一段文字,在那场蔡真和伍仲文举行的“囚车上的婚礼”中,镣铐是他们的花环,雪花是他们的婚纱,枪声是他们的礼炮,何孟雄当了婚礼主持人,烈士们一起唱起了《国际歌》,殷夫贡献出了诗朗诵,年少的欧阳立安也加入了朗诵的队伍。“我虽然没有在现场,但烈士给我们后人留下的作品,组成了‘囚车上的婚礼’的最后一幕,非常悲壮。今年的‘4·23’读书日上,我在上海看了一场以此为主题的芭蕾舞演出,当时我身边许多观众忍不住地掉眼泪。”这一切,都丰富了何建明笔下的欧阳立安。

力量。它提醒我们,在社会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和及时认真地总结基层的创新成果。联想到当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大包干”行动,再看上述这几个村子的巨大变化,就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基层很多源于实际的治理思路和建设法则,也许比有些凭空设计出来的机械简单的所谓“蓝图”更加富有价值。因此,《大国治村》提供的这些真实、生动、形象的典型案例,非常具有学习参考价值,是活的榜样,是十分灵动的乡村治理教材。

报告文学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生长的文学根苗,是在与社会生活相依相伴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李英的报告文学创作,很能够说明这一点。从和宋晓军合作创作《让百姓做主》开始,他就一直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现实的社会生活,在生活中发现创作的题材与对象,寻找前沿的苗头和现象,并及时将这些发现、感受和认识真实地表达出来,扎根深、接地气,独特新颖,富有社会影响力。

中国的文学创作,一贯主张“文以载道”“经世致用”。这是一种鄙视空谈、看重内容价值的文学主张。它虽然不放弃文学艺术的方法与形式的追求,但明显更注重作品参与和影响社会生活的内容价值。报告文学这种经世致用的途径,在真实的社会生活表达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作用。李英的这部《大国治村》,正是体现报告文学这些独特品质的很好例证。作品用真实质朴的语言对乡村振兴中的实践者进行描绘,充满热忱,透出热情,对很多故事的叙述,对很多人物的刻画,令人印象深刻。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因为作家紧紧地投身社会生活中而富有生命力和价值。我想,《大国治村》也有这样的质地和特性!

### 苦读法:咀嚼品味

王冶秋描述过这种阅读过程:“这篇民族的杰作,绝不是看一遍所能消化的。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嘔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视阿Q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阿Q还是阿Q;第七遍:阿Q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而为一;第九遍:又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右舍;十一遍:扩大到全国;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个镜;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起码要读十四遍,才能接近鲁迅《阿Q正传》的本意,可谓是一种“苦读”。

我们承认鲁迅文章可能难读难懂,常说些逆耳之言,但又包含深厚意义。要读懂鲁迅,必须下一番苦功夫,不能图轻松。

这60年间,我个人阅读《阿Q正传》何止十四遍,已超过一百四十遍。有的年轻朋友在我讲这一段时还不太相信这个数字,其实我一直以此书为镜像不断反省自己,至今仍然感到需要继续读下去、自省下去,有些地方没有读透,还需要再读、再回味、再思考。这种需求之下,苦读当然是必要的。

### 悟读法:探究哲理

高尔基称赞契诃夫的作品“能够使人从现实性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哲学境界是文学作品最难达到的巅峰。鲁迅写《阿Q正传》也正是从现实生活中的阿贵抽象出来,以“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这种粗俗、简单的话表现了精神胜利法的荒诞逻辑,达到哲学的概括。

我们在读《阿Q正传》时,不能脱离实际,但又不能过实。鲁迅创作《阿Q正传》时,之所以把具体内容完全抽空,阿Q的姓氏、名号、籍贯等无从确认,未庄也模模糊糊,就是引导读者脱离过实的窠臼,进行超越性的想象,悟出后面所藏的深邃哲理。《阿Q正传》创作主旨是对国民性弱点或民族病作有力的暴露与打击。通过阿Q,他不仅批判辛亥时期的“革命”,而且广及整个人类社会怎样结束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进入政治文明化的问题。要理解这更深的历史哲学,就须有更加超越的悟性,更加强调“悟读”。

归根结底,《阿Q正传》是一部鲁迅先生这位大哲创作的启人精神反思、开出反省道路的哲学小说。

这五种读法的划分,是为了便于说明,其实,在阅读过程中,它们相互交会,共同作用,从而完成对作品的理解、鉴赏。

如今,走在上海的马路上,一些弄堂依然密如蛛网,人流如潮。这也是何建明笔下的上海地下党活动场所,他一次次地在弄堂里行走,寻找……“一次,欧阳立安去一处秘密地址送信,刚拐进弄堂口,就见秘密联络点的窗台上有暗号,告诉他此处目标已经暴露。在敌人一步一步逼近时,他突然看到弄堂内有一户人家的门开着,而且这户人家的后窗似乎连着另一条弄堂。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一个箭步闪进这户人家,穿过前堂厨房和后面的房间,跳上一张靠墙的化妆台,然后一脚踢破后端的玻璃窗,跃身跳进了屋后的弄堂。”对上海石库门弄堂结构的熟悉与亲近,才让何建明笔下的少年有了一口气呵成的灵性。

### 雨花台前的行走

如今上海到南京的高铁只要一个多小时,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上海进入南京,对于中共党员来说,就是跨越生死之门。

何建明前后三次去过袁咨桐的家乡,这位雨花台年轻的烈士出生在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习水县土城。父亲是位开明而有远见的地主,将三个儿子送到贵阳城的教育家黄齐生家。袁咨桐不久便随黄齐生闯荡上海,后来到南京安家,进入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一名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0年前后,袁咨桐第三次被抓。南京政府宪兵司令谷正伦及妻子均为贵州人,黄齐生则是其妻的老师,前两次都放了袁咨桐。第三次,谷正伦亲自做思想工作:“明天就枪毙你,还做共产党吗?”少年并不吱声。“好,我给你买好出国的船票,送你去日本留学,你就不要回来了。我也不要你签字。”少年依然不从。

国民党当局杀害了袁咨桐,因为他才十六岁,怕惹起公愤,所以偷偷地在文件上把“六”字改为了“八”。

每一次在细雨中望见龙华的桃花,每一次走至雨花台长长的台阶,何建明的脚步都会有些沉重,心情亦随之沉郁,但神圣和庄严之心换成了责任和使命,让他笔耕不辍。

我已经看见,一大群站在五光十色的流行文化中东张西望的作家中,终于有人回过头来瞧一瞧西边天际将灭的晚霞。这晚霞宁静自守,寂寞而孤独。可是你如果扭身走近它——走进它,便会沉浸在它一片异样美丽的金红的霞光里。这是我对祝勇的感觉。他已经将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人不多。因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作历史的残余,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全都深在其中。特别是当农耕社会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祝勇反而来得更加急切和深切。他像面对耄耋垂老矣、日渐衰弱的老母,感受着一一种生命的相牵。我明白,这一切都来自一种文化的情怀!

他说,他对于这些将要失去的事物,没有生者的优越感,没有陌生人的同情。这是因为,他把它看作养育自己的文化,看作自己的文化母体。文化也是代代相传的生命。他的文化情怀来源于文化关怀。

他虔敬先人的创造,追寻祖辈的精髓,欣赏昔时的生活气质,并用精致的文字勾画出在时间隧道中失散了的画面。但他与“寻根文学”不同的是他更关切文化的本身。我想,不是任何人都会富于这种文化情怀的。可是在当代社会与文明的转型期,历史文化多么渴望这种关怀!

从他的书中,我看到一个年轻的文化人正在一步步走进文化传统的腹地。我也巴望他忽然转过身,伸开双臂,展开胸膛,保卫和呵护他所珍爱的一切。

## 祝勇的文化情怀

冯骥才

双塔

准万年(山西建投集团顾问)

本版面向读者征集“双塔”刊头作品以来,陆续收到一批书法与美术设计作品,并择其适用者刊载。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参与刊头征集活动,作品原稿请挂号寄至:太原市新建路78号新闻大厦太原日报专副刊采编中心 孟中收;邮政编码:030002。或可直接送交(新闻大厦18层,联系电话:8222115;邮箱:tymz0227@163.com)。并附作者地址、邮编、电话、职业身份介绍。